

古典社會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與比較： 以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為例

陳迪暉*

摘 要

依據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一種知識或論述的產生與當時所對應的社會條件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社會學的產生亦不例外。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生產模式以及社會生活上都發生劇烈的變革，當時一些社會學家對此現象紛紛提出了不同的解釋焦點與研究方法，當中最為後人所重視的當屬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及齊穆爾了，雖然他們所面對的是相同的一個社會情境，所處理的解釋焦點及研究方法具有相似性，但當中仍存在著許多差異性，因此本文將針對這些相似性與差異性進行比較分析，以期能為古典社會學家的理論內涵做一綜合性的整合。

關鍵詞：資本主義、馬克思、韋伯、涂爾幹、齊穆爾

* 南開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Focus and Method of Treating Capitalist Society between Marx, Weber, Durkheim and Simmel

Chen, Ti - hui

Abstract

Accord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re existed relativity between knowledge discourse and its social condition, this perspective included sociology. The Western-Europe capitalist society appeared great change of economy, politicalization, culture, productive pattern and social life during 19th into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some sociologists enabled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their society. Now, these famous sociologists are Karl Marx, Max Weber, Emile Durkheim and Georg Simmel, although they faced the same social situation,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among them despite simila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se similar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make a generally integration for classical sociologists' theories connotation.

**Key words : Capitalism, Karl Marx, Max Weber, Emile Durkheim,
Georg Simmel**

古典社會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與比較：以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為例

陳迪暉

壹、前言

社會學誕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歐洲資本主義生產及生活方式成形，使原有的社會秩序發生變遷，社會動亂不安，宗教的控制力量式微，全球性的探險與殖民發掘出不同社會的新生活方式，產生工業資本家與勞工的新社會階級並對封建貴族的既有法則提出挑戰。許多農民成為工廠的工人，使傳統仰賴明確定義社會關係而得以密切結合的社區，因社會環境與歷史的戲劇性變遷而改變，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在同一廠房內為薪資而工作，不再為土地與保護而交換服務，或自行生產所需的食物。從此，家庭必須保護自己、購買食物、為自己的房屋付租金等，皆是不同於過去習慣的方式，新的社會問題自然從這些資本主義下新的生活與工作條件中產生出來。這些由於資本主義所引發的傳統社會結構的變化，人口往都市集中的趨勢，資產階級的迅速興起，整個社會處於動盪狀態，為解決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及重建社會秩序，乃有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6)及齊穆爾(Georg Simmel, 1858-1918)¹等人提出各自不同的處理焦點主軸及方法。

Simmel 除了以著作範圍廣而專與數量多著稱外，有些理論家更將他定位為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繼 Marx、Weber、Durkheim 之後的第四大家。他研究的議題極為廣泛，廣及性別、家庭、生死、愛欲、貨幣經濟、宗教、藝術、時尚、道德倫理、科學等。無論是古典或現代的社會學家，大多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本文之所以在社會學古典三大家外選擇將 Simmel 納入進行分析比較，是因為 Simmel 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方法偏重檢視現代中的精神品質和個人的內心結

¹ 在社會學領域中，通常將 Marx、Weber 及 Durkheim 並列為古典社會學理論三大家，近來 Simmel 在社會學領域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有人將他列為第四大家；以下內文中述及這些人時將用原文姓氏書寫，不再翻譯成中文。

構，其論述方式的細緻和思想內容的獨特性，實際上添補了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雖然資本主義學說主要仍以古典三大家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為主，但 Simmel 的文化現代性思想已經構成與上述兩種理論的互補關係。相對於古典三大家的研究，Simmel 開展的是「心理主義式」的個體心靈和體驗結構的現代學說；相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Simmel 隱含了「價值中性」的社會解讀，故 Simmel 的學說超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對立的兩個極端。此外，Simmel 在看待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經濟行為與社會關係時，與古典三大家同樣反對功利主義式的「個人自由競爭經濟利益(interest)」這樣的窄化論點，而把利益放進整個社會關係來理解。因此，在此相同的基礎下，Simmel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與方法究竟與古典三大家有何異同，就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貳、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處理資本主義社會之焦點與比較分析

雖然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這些人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是在論述內容中是極為不同的，有人採革命手段，如 Marx；有人採保守的改革手段，如 Durkheim；有人採樂觀論，如 Marx；有人採悲觀論，如 Weber 及 Simmel；有人從鉅視觀點來分析；也有人從微視觀點來看問題。下面將分別從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的論述來解讀並比較他們處理資本主義社會的焦點主軸。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Marx 認為階級衝突乃是因為擁有土地、工廠、機器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剝削實際從事生產經濟財貨的無產階級工人而引起的。Marx 相信兩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衝突會繼續不斷，直到工人的情況壞到使其不得不聯合起來推翻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必須組織和發展一種共享利益與苦境的階級意識；而資本家則會運用其權力，塑造被欺壓的無產階級的宗教信仰、藝術感受、休閒活動與消費偏好等，以期達到促進資本家利益和增加勞動者的錯誤意識使之無法感受到工人在資本主義下被剝削的狀態。「在每一個時代擁有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同時也控制了心智生產的工具，因此，一般而言，那

些缺少心智生產工具者的概念乃順服了它，主宰的觀念，不過是支配的物質關係攫取成為主宰的理念」(Marx and Engels, 1845-1846/1970: 64)。在 Marx 的早期著作中，以「異化」(alienation)來論述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普遍命運；在成熟的《資本論》(Capital)論述中，進一步地闡明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受到資本家剝削的證據。

Marx 在其許多的著作中洞察資本主義社會下經濟因素塑造社會模式的角色，注意到錯誤意識與階級意識，運用歷史研究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與制度變遷的過程。Marx 從唯物史觀的社會矛盾性與對立性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一致，由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幅進步，但生產關係卻沒有跟著進步，兩者之間乃產生矛盾，社會危機或社會革命乃應運而生。

Marx 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由於私有財產制，社會被劃分為個別相互敵對的階級。只有消滅私有財產並經由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社會才可能走向沒有階級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此外，Marx 認為異化不只出現在工人身上，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異化，牽涉到人們的日常活動，而不像其他形態的異化，僅僅牽涉到他們的心靈。因此，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影響到兩個層面，即意識與現實生活。雖然在 Marx 晚期作品中已不再使用異化這概念，而改以「商品拜物教」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和商品間的關係。

在生產方面，Marx 認為在資本主義中，物品不再是為自己或周遭的夥伴而製造，相反地行動者是為了其他的某些人，例如為資本家而製造物品。「原本勞動是使用價值(use-value)的創造者，獨立於任何類型的社會之外，它是人類存在的必要條件」(Marx, 1867/1967: 42-43)，後來產品不再是直接地被使用，而是在公開的市場為了金錢而交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用價值被交換價值所替代。「當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製造物品時，他們在商品製造中的角色，和對商品的控制變成了神祕化，工人被引導相信物品和市場對他們而言具有獨立存在性，商品乃變成一個獨立的與神祕的外在實體」(ibid: 35)。「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擔任創造資本的任務，但資本經由資本家剝削工人，工人為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剝削，他們卻忘記那是經由他們的勞動所製造的，勞動這個社會現象，在資本主義此一特殊環境下，卻變成了商品」(ibid: 168)。

在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流通，從購買行為開始，然後出售而結束流程，其結果

使這個體系更加可能外在於行動者，且對行動者產生強制力量。Marx 也批判了資本主義下的分工與私有財產，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每個人侷限在一窄化的專業裡，阻止了行動者實現和表現他們的人類潛能；而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的產物，工人為私有財產所控制，一旦私有財產存在，它轉而進一步強制人類在資本主義中與生產過程之異化，如果人類要實現他們的人類潛能，那麼人類必須推翻打倒私有財產、分工和所有的其他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成份。

Marx 也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宗教現象及國家角色。Marx 認為資本主義下宗教創造假意識與假福利感，使工人看不見自己正在受資本家的剝削，而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角色只是資本家的「走狗」，兩者一起聯合剝削工人而已。最後，Marx 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危機加深，例如無產階級化、獲利率減低、貧窮化以及過度生產等，加上無產階級最後起而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經將毀滅，朝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痛苦階段而已，由此可知，Marx 對未來仍是抱持著革命樂觀論。

Weber 對資本主義的論述著重在資本主義如何形成、資本主義的理性化(rationality)、人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行動及命運、經濟生活、權威結構以及科層制(bureaucracy)等面向上。在資本主義的形成上，Weber 認為基督新教和資本主義的形成間具有選擇性的親近性。在他的分析中，他觀察到基督新教的倫理鼓勵努力工作、節儉、儲蓄及再投資，這些活動實又代表資本主義的核心，與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經濟行為相一致。Weber 認為新教倫理提供了倫理性約束，它打破了傳統主義在經濟行為領域的影響，甚至培育出嚴格自我的約束的精神，鼓勵人們理性的、有規律的應用到他特殊的任務上，這些任務是上帝召喚他們在職業世界中所執行的，Weber 強調宗教理念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影響。但 Weber 所談的資本主義是較特殊的，是基於一個持續運作的市場，伴隨著自由勞動，其他還有家計和生產的分開、生產之東西可計算、法律、行政的規則也都能設先預想以及公民、普羅概念，所以 Weber 所談的資本主義是西方特殊的資本主義，探討當時西方各領域和資本主義之關聯，而非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的理性化上，Weber 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光是宗教的理性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存在法律、經濟、政治等面向的理性化。Weber 說理性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推動力，現代人的精神命運。只講手段，不談目的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理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代了傳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因而是除魅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世界理性化趨勢的結果，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理性：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這二種理性之間經常存在對立與緊張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漸由效率、計算性、破除神祕性的規範與價值支配，最後，或許也是終極的，資本主義社會理性化捲入了去除人性之境，刪除和缺乏對於人類價值的關切。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以前能由機會、感覺、熱情與投入來處理的，只能藉著個人的懇求和個人的忠誠來面對的，以及只能由美德和倫理來決定的，現在都已經理性化了，同時人們也可以加以計算和預測了。值得注意的是，對 Weber 而言，理性化的探討並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Weber 主要是從理性化的角度來思考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何以成為今日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宗教、法律、政治、經濟等面向的理性化，致使形式理性過度膨脹而淹沒了實質理性，形成了非理性，這種非理性的形成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弔詭。

從資本主義社會中來看個人的社會行動，可以發現，「形式理性的行動凌駕於其他種類的社會行動之上，人們考慮的是手段與目的間的關係，隨著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具性理性的進一步發展，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下愈況地走向一個鐵的牢籠，這個鐵的牢籠是理性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形式理性的全面勝利，然而這工具性理性的勝利卻意謂著是一種非理性的控制」(Weber, 1921/1978: 26)，一種傷害到資本主義社會下基本人性尊嚴的控制。

由於資本主義的理性化前提，致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權威結構也必須跟著朝向理性的法理權威發展，使得權威結構奠基在客觀原則上，而非主觀的情感性或傳統原則。在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下，傳統的社會階級定義也變得更複雜，Weber 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權力、社會權力及政治權力間個人所享有的任何一個變項，都會對他的生活機會及生活型態產生巨大的影響。此外，因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理性化管理功能的科層制開始形成，雖然可以達成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效率與理性客觀，但隨之而來對人的禁錮，以及傳統、價值之失落，卻是 Weber 對資本主義社會所憂心的，對於未來不像 Marx，反而表現出悲觀的態度。

Durkheim 對資本主義的論述著重於憂心資本主義社會所導致的群體整合連

帶衰退造成道德及集體意識的流失，資本主義社會的團結和整合又依靠什麼呢？Durkheim 認為「必須為經濟秩序中的職業群體(professional group)賦予一種它們從未得到過的穩定性並確立職業倫理，法團的必要性並非基於經濟基礎，而是源於道德的理由，惟有借助法團體系(corporative system)，經濟生活的道德標準才能形成」(Durkheim, 1983: 29)，因此 Durkheim 關心資本主義社會賴以持續的道德架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因規制鬆散所導致的迷亂(anomie)狀態。

Durkheim 不同意 Marx 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因持續的階級衝突而得以運轉的觀點，他相信有某種基本力量在維繫社會，此可見於「簡單的理性契約與協議須立基於預先存在的相互信任，而不是單靠強迫作用來宣布意志，沒有互信，每個當事人都會浪費許多時間精力以確保對方會實現其承諾」(ibid: 208)。Durkheim 稱此種預先存在的信任為集體意識，是一種以共同的儀式、信仰和法則為基礎的歸屬感和相互義務，它遍及整個社會，對組成的個人具有外在於個體獨特性的束縛力。「同一社會的成員，其共同的信仰與情操整體，形成了決定體系，此體系擁有自身的生命，可以稱之為「集體的」或「共同的意識」，雖然它只經由個別的意識來展現，卻是完全迥異於個別意識」(Durkheim, 1893/1984: 79-80)，集體意識的本質與社會同樣會產生演化，由簡單分工與重視共同道德義務的傳統社會秩序，發展為較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分工與社會秩序。

資本主義社會不像傳統社會主要依賴共同信仰與儀式的結合，而是透過精密的互賴關係整合在一起，幾乎我們所需要的每樣事物皆由他人製造提供，而他人也同樣由我們提供需求，若無相互的信任，此種精密的分工將會破壞。謂此 Durkheim 把傳統社會的分工稱為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之對應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則是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分工。「機械連帶是建立在社會各份子間的同質性上」(ibid: 32)，社會的價值和行為融洽一致，人們重視傳統關係，因此社會的束縛力也較強，各個人之間的差異較小；有機連帶是基於個人的不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高度分工化的結果，每一個人都變得特殊化，並缺少同質性，同時個人間的互相依賴性相對增強，更必須相互合作。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就在於有機連帶的高度分工。

在機械連帶的社會中，人們深深地堅信共同道德與強烈的集體意識；在資本主義有機連帶社會中，幾乎不存在一有力和強制的集體意識和共同道德，

Durkheim 最為關切的課題，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意識與共同道德之強度沒落衰退」(ibid: 145)。「在 Durkheim 眼中，資本主義社會正面臨道德連帶之病態地鬆懈的危險」(Ritzer, 1995: 176)，為了解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問題，Durkheim 並不像 Marx 採取革命手段，而是採取社會改革主義，認為社會問題是可治癒的，也不像 Weber 及 Simmel 那樣的悲觀。Durkheim 企圖以學校的道德教育社會化、職業結合及個人主義崇拜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意識及共同道德衰退的問題。Durkheim 認為「在道德教育中，道德目標也就是那些以社會為對象的目標，而合乎道德的行動，也就是根據集體利益而行動」(Durkheim, 1925/1973: 59)，「但是學校只是道德上的代理人，通過學校，兒童能夠系統地學會認識和熱愛他的國家，為今日學校在國民道德的塑造中所扮演的角色賦予突出的重要地位」(ibid: 79)。

Durkheim 區分了人的內在不等與外在的不平等，對他而言，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不斷消除外在的不平等。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導致了迷亂的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道德的衰退，個體未能面對充分的道德或一個清晰的規則，知道什麼是或什麼不是正確的行為時，就產生了迷亂，進一步產生如自殺的社會問題。Durkheim 的觀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病理，乃是在於迷亂的分工之上。

綜合比較上述分析，Marx 的觀點建立在唯物史觀上，以其獨特的辯證唯物主義所形成的唯物史觀為基礎，確認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內存著矛盾統一的性格。Marx 認為人所持有的理念和價值並不是資本主義形成的主要來源，資本主義的形成主要係由經濟的影響所促使的，階級間的衝突與此息息相關，並為歷史的發展提供動力。Marx 論述了原始共產、奴隸、封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各歷史階段，但 Marx 所關注在於影響現代社會發展最鉅的資本主義上。在 Marx 看來，資本主義這個生產體制內部充滿著矛盾，充滿布爾喬亞階級與普羅階級的衝突與對立，階級關係和私有財產是人類社會異化的最終結果，他所建構的共產主義，則是這種結果的積極揚棄。依此，Marx 預言資本主義將來會被他自己本身所創造的客體（勞工階級）所取代，之後將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將歸為共有，一個平等的社會秩序將被建立。Weber 其作品涵蓋了經濟學、法學、政治、比較史學等領域，他所關心的亦包括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Weber 對資本

主義的分析圍繞在「解除魔咒邁向理性化」這個主題上，他從宗教、政治、法律、都市、藝術等多元的觀點，對於理性化從事專門研究。理性化的成長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取向，不過卻由於理性化的極度擴張，終將使人類陷入一場不可避免的惡運。雖然 Weber 受 Marx 的影響，卻又反對 Marx 的唯物史觀，認為理念與價值對社會變遷的衝擊是與經濟條件相當的。例如 Weber 比較了西方與中國、印度等地文化的差異性，並且試圖分析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獨特性，特別是在西方基督新教教義下，強烈的影響了資本主義的興起，此為西方特有的現象而非 Marx 所說的歷史規律。而 Durkheim 也和 Marx 及 Weber 一樣，關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Durkheim 認為社會分工是資本主義的一環，試圖以此來理解這些現象。Durkheim 認為社會分工逐漸取代宗教成為社會凝聚的主要基礎，社會分工一旦擴充，人與人之間越相互依賴，但現代世界變遷過程迅速而激烈，引起了主要的社會難題，與「脫序」(anomie) 環環相扣，過去由宗教所提供的道德控制與標準，大都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崩潰，與 Marx 和 Weber 不同，Durkheim 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不是階級衝突也非理性化牢籠(iron cage)所造成，而是道德瓦解危機。

Simmel 在處理資本主義社會時最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歷史發展趨勢的文化與社會的心理矛盾。他的觀點明顯是開明進步主義和文化悲觀主義的矛盾混合體，在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著作中和在德國唯心主義的思想中都體現了相同的觀點。Simmel 創造性地重新描述了歷史模式的自由觀點，Spencer 和 Durkheim 這樣的思想家也提倡過這種觀點，他的另一觀點更多地應歸功於 Marx 和德國的文化悲觀主義，而不是英國和法國的進步思想。雖然在世界觀的某個方面，Simmel 受到法國和英國思想家進步的自由觀點的深刻影響，但他在社會學史上還是屬於悲觀文化的那一派。

Simmel 對於美國社會學理論和一般社會學的影響不同於 Marx、Durkheim 及 Weber，早期的美國社會學家普遍熟知 Simmel，尤其是芝加哥學派更與之關係密切，推動芝加哥學派發展的兩大主力，派克(Robert Park, 1864-1944)與史莫爾(Albion Small, 1854-1926)，早年即曾遊學德國，投身 Simmel 門下學習。「Simmel 乃是以鉅視衝突理論與微視社會學家著稱於社會學上，世人尤其重視他對小團體研究、符號互動論與交換理論發展的顯著地位」(Ritzer, 1995: 282)。然而，人

們經常忽視他探討個體與較大層次社會之間關係的廣度理論。

雖然 Simmel 以微視社會學著稱於世，但他對資本主義的關懷仍表現在他所謂個體文化(individual culture)與客觀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衝突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都市化所造成的新社會問題上。資本主義社會對 Simmel 來說和 Weber 類似，都是一種理性化的結果，這種理性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高度膨脹的結果。Simmel 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基本上不僅受其社會結構影響，同時，也受其文化產物影響，在此，Simmel 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產物的影響尤其重要。

Weber 和 Simmel 均看到現代社會文化的一個特徵乃是理性化傾向，Weber 處理的是理性化社會的制度轉型和科層表現，但 Simmel 則關注在文化理性化的重新定位後，現代人心理體驗結構重組的問題，以及在理性的精神特徵之下，現代人隱含的無意識生命界定，否則他就不會談貨幣開展之下個人的漠然 (blasé reserved)、玩世不恭 (cynicism)、矜持 (reserved) 等現代心理特徵。可以這麼說，Simmel 的目標是把握真實的內在生活世界變化，觸及散落在生活角落裡的心理和感覺，是以一種「感性化」的方式體驗著現代社會貨幣經濟導致的文化品質改變。

Simmel 清楚的指出，他的主要興趣之一就是有意識的行動者間的互動，不像是 Durkheim 表示關注於社會事實(social fact)，因此 Simmel 專研社會學的較小規模焦點，也包含了潛意識；對 Marx 來說，專注的並非具有意識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而是專注不同意識階級間的互動，專注的不是個人潛意識；特殊的是 Weber 卻同時關切於個別性和通則性，即注重個人意識，如瞭解(verstehen)，也注重通則性，如理性化；相同的，Simmel 也注重個人潛意識，如主觀文化，也注重通則性，如客觀文化。

「所謂個體文化，是指行動個體所能創造、吸引和控制客觀文化之諸要素的能力；至於客體文化，則是指人類所創造的事物，如藝術、科學與哲學等」 (ibid: 287)。在資本主義社會中，Simmel 指出其間存在最重要的問題，乃是客觀文化本身具有生命，文化產物的存在，與創造它的行動者之間形成了衝突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創造文化，但是因為人類具有物化社會實體的能力，於是文化世界和社會世界擁有自身生命，這個生命逐漸轉回支配那創造它的行動者，並

且無形中再創造行動者。文化的客觀，彼此連結在一起，形成一獨立自主的世界，個人的主觀意識愈來愈無法與客觀文化連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雖然擁有創造和再創造文化的能力，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的發展下，文化在社會中會對行動者產生愈來愈強的強制力量。

真正最令 Simmel 憂心的事，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的成長對個體文化的威脅，可以從《貨幣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一書中看出。Simmel 也分析了資本主義都市中的互動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深遠地影響了人際關係的本質，強調計算性與理性，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實的人際關係衰落，人類的價值被化約成金錢計算，人的價值可以用金錢來表示」(Simmel, 1907/1978: 356)，「生活中的主要變遷趨勢是質化約為量，在貨幣中到達了最高、最「完美」的獨特代表」(ibid: 278-280)，「貨幣原來只是實現許多目的的手段或最單純形式的工具，最後卻成為一種最極端的手段，變成目的本身」(ibid: 210)；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分工的社會，專業化在不斷擴張的客觀文化生產活動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其結果加速了個體文化衰退，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文化的擴張，我們是愈來愈難保留個體性。Simmel 認為，「文化要素取得了固定的本體，具有自身邏輯與運行法則，這種特質不可避免地把他自己置於遠離精神動力的位置，其中這個精神動力創造了它，最後卻使它們獨立」(Simmel, 1921/1968: 11)。

Simmel 用貨幣來解釋社會的經濟生活面向，Marx 則從資本來解釋，因為在 Marx 的觀點中，最普遍的經濟結構要素是資本，資本作為一個獨立性的客觀結構就如同 Simmel 所說的貨幣一樣，「資本經由操作它的資本家剝削工人，而工人過去和現在卻在擔任創造它的任務」(Marx, 1867/1967: 333)。Marx 用資本的觀念對古典經濟學作一反省，從而成為一種對社會關係的基進性質探討及從弱勢團體立場所做的批判，因為 Marx 把政治經濟學當成從整體上加以批判的對象，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在理論上的意識形態表現，不是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私經濟學。而 Simmel 的《貨幣哲學》本意並非像 Marx 的《資本論》那樣只單純地分析資本的經濟學客觀性問題，而是將貨幣與心理學、精神文化甚至形而上學聯結起來，展現貨幣對個人內心世界、個體生命力、對人們命運關聯以及對整體文化發揮的影響。

與 Marx 的《資本論》一樣，Simmel 的《貨幣哲學》也解釋了西方社會的貨幣經濟現象與社會現象，但 Simmel 解釋方式顯然不同於 Marx 對經濟制度的分析。分析貨幣的社會經濟機制不是 Marx 貨幣理論的重點，貨幣及其制度化的現代發展對文化生活的影響，才是 Simmel 貨幣文化對現代性理論的要旨所在。貨幣經濟的產生雖然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在 Simmel 看來它更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Simmel 認為貨幣在社會經濟事務中產生了宏觀效應，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引發的社會文化主導了精神觀念轉變和對個人心理產生影響。此外，Simmel 從貨幣的角度來分析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自由時，似乎是給予較為正面的肯定，但不帶有價值成份，而 Marx 從資本的角度來分析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自由時，似乎是一種否定，並帶有強烈的價值批判色彩與願景。Marx 從資本的觀點來分析社會，其論述方式比起 Simmel 而言帶有較多的價值判斷色彩，因而堅決地斷言一個理想的社會樣貌應該是如何以及應該採取的手段，而這也正符合了他的辯證法特色

在微視觀點方面，Simmel 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和以前的社會不同，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很多性質不同的集團成員，沒有那一個集團可以擁有和支配個人的一切，個人可以在性質不同的集團之間流動，每個集團所能約束控制的只是人的一小部份」（Simmel, 1971: 254），一個人和其他的人可能同處於一個或多個組織，和 Durkheim 類似，Simmel 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這種轉變將造成對人控制的減弱，難以形成共同的集體意識和道德。和 Durkheim 不同的是，Durkheim 相信社會病態是可以經由社會改革所治癒的，但 Simmel 和 Weber 類似，對於資本主義理性化發展的結果，卻表現出不可治癒的悲觀態度。此外，Simmel 也提出了資本主義都市化所造成的娼妓、貧窮、陌生人等社會新形式與問題。

參、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處理資本主義社會之方法與比較分析

在不同意德國精神科學和歷史主義的個別性與獨特性的方法之下，Weber 發展出一種關鍵性的概念工具，那就是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概念；相對地，Durkheim 提出社會事實這一概念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工具，其產生的背景及目的和 Weber 不同。為了能有助於社會學脫離哲學的陰影，和獲得清楚與客觀性，

Durkheim 主張「社會學的獨特題材，應該是研究社會事實，由於社會事實被處理為一「事物」(thing)，所以它能夠被實證經驗的研究，而不需要將它哲學化」(Durkheim, 1897/1951: 313)。

Weber 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科學體系可以完整再造具體的實體，也沒有任何的概念性工具能夠充分處理特殊現象的無限複雜性，所有的科學都牽涉到選擇和抽象，理想類型的概念就是要為這個困境提供一個出路；相似地，Durkheim 的社會事實概念也具有此種目的。「社會事實和理想類型同樣都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社會中的普遍現象」(Durkheim, 1990: 1)。理想類型的建立只是以一種「價值關聯」為前提，並不一定完全是真實社會的反映；同樣地，社會事實的真實性並不是普存的，其真實性與否和情境的轉移相依，但理想類型是一種假設；而社會事實是一種建立在「規則化」基礎上的建構。

理想類型是一個分析性構造，為研究者提供一個測量竿，以探查與具體事物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為比較研究提供一個基本的方法藉由理念型的建立。「理想類型可以與經驗實體進行比較，以建立其分歧性與相似性，而以最確定、毫不曖昧的可理解概念描繪它們，並且能夠因果地解釋與理解它們」(Weber, 1903-1917/1949: 43)，雖然理念型係衍生自實際世界，卻不是這個世界的鏡中倒影，反而，它只是片面地誇大實際世界所發生的事物，在 Weber 的觀念裡，「理念型若愈能誇大其實，則它益能應用於歷史研究」(Ritzer, 1995: 228)。一個理想類型的建構是藉著一個或多個觀點的單方面強調，以及將許多分散、不連續、時而出現和有時不存在的具體個別現象加以綜合而成，這是按照單方面所強調的觀點，把它們安排到一的分析性構造中，理想類型並不牽涉到道德理念；相異於 Weber，Durkheim 的社會事實概念目的並不在探查與具體事物的相似性或差異性以進行比較研究，而是在於以一個先存的社會事實去推論出一個新的社會事實的決定性因果關係，特別是由物質性社會事實與非物質性社會事實的因果性。「Durkheim 的研究方法首先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起步，這是因為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對他而言，雖然不是最重要，但其要素卻經常是他方法建構中的因果優先因素，而且，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影響了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ibid: 172)，這相對於 Weber 的選擇性親近性觀念。再者，理想類型並不全然是真實社會的反映，藉由理想類型與真實社會的比較，可以考察差異原因，

但是就 Durkheim 來說，「對真實社會的了解，只能以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事實來理解另一個社會事實」（Durkheim, 1990: 100），並不是以不完全真實的理想類型來理解社會。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也不同於前述的理想類型建構過程，Durkheim 認為，社會事實的產生是用事實歸結出觀念(例如統計資料)，絕對不能如理想類型那樣用觀念估量事物，社會事實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質，只有堅持客觀性才不會偏離它。Durkheim 認為，「個體的心靈，藉著混合形成一群體，如果心理上個人願意，就產生存在，但不過是構成一新類型的肉體個體」（Durkheim, 1895/1964: 103），看來，社會事實的客觀絲毫沒有給具有主觀價值關聯為出發點的理想類型餘地。

社會事實的建構是社會研究從主觀意識階段邁向客觀實際階段的真理法則，不同於 Weber 及其理想類型的在從事社會研究前的准許存在主觀性。對於研究現象的選取，理想類型是將許多分散、不連續、「時而出現和有時不存在的」具體個別現象加以綜合而成；但對社會事實而言，認為忽視普遍現象，而且對事物的判斷標準不一，各人就會有各人不同的想法，這不僅會發生混淆和錯誤，而且會使科學成為不科學。科學的直接對象是研究規則的現象，社會事實必須將一社會情境普遍現象作為規則現象的標準。最後不同的是理想類型並不牽涉到道德理念，但成熟的 Durkheim 強調「只有社會事實，尤其是道德法則內化成個人的意識時才能有效指導與控制行為，非物質性社會事實的確固著在個體的心智過程裡」（Durkheim, 1893/1984: 350）。

Weber 認為理想類型並不牽涉到統計的平均值；但就 Durkheim 而言，社會事實，例如自殺率，是建立在客觀科學的統計(率)上。理想類型牽涉到典型行為的強調。Weber 手上許多理想類型都牽涉到集體性，並非個人的社會行動，但是集體社會關係中經常可以建構出行動者從事被期待的社會行動之可能性，「這些集體，必須被視為只是個別人們之特殊行為的組織產物或模式，如此才能在主觀性詮釋行動的過程將其視為行動者」（Weber, 1921/1978: 13）；和 Durkheim 的社會事實相似，社會事實的形成基礎雖然是來自個人，但是結合群體後所產生的社會事實卻又開始不同於個人，開始限制個人的社會行動，此時，個人社會行動被期待朝向社會事實，如集體意識此一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力量。

理想類型並不對應於具體的實體，它總是與實際的情形保持一段差距。它從

實體的某些要素中建構出來，並形成邏輯清楚而有條理的一個整體，但在真實的世界中不一定可以找到與之對應的現象；相反的，雖然社會事實並不一定在任何不同的社會情中都具有真實性，但就某一社會情境所產生的社會事實而言，就具有真實性(reality)與對應性。

理想類型能讓人們建構一種使現象或事件關係變得更明顯的假設，或與該情況產生以後的結果相關的假設，如果我們希望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源，那麼以宗教改革時所產生的各種不同宗派的特點為基礎，去建構新教徒的理想類型可能是適當的，於是我們繼續在新教的產生與現代資本主義的關係下處理其「相關性」和「因果歸屬」。「Weber 所談的因果分析，實際上主要所指便是所謂「選擇性的親近性」，透過經驗的考察，理念類型的運作，以及適當的詮釋，我們所要掌握的是在歷史的時空條件中，那些因素彼此較容易相互的作用，而產生特定的結果，因素與因素之間的關聯是有選擇性的，最重要的是，這種親近性並不是單純的變數間的關係，它必須在歷史文化的脈絡去瞭解」（高承恕，1988：8）；但社會事實是更強硬的，它的目的在於找尋社會事實與社會事的客觀確定因果關係，而不能滿足於「相關性」的結論。

理想類型，它是社會科學家為了捕捉某些社會現象的首要特徵，所建構出的概念；但社會事實本身就是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目的，並導出另一個社會事實。為了產生理想類型，研究者首先必須將自己融入歷史實體裡，然後從這個實體中衍生出理想類型；相似的，社會事實的研究必須將此一社會事實對應到產生該社會事實的社會情境中，才具有真實和意義，和理想類型一樣，不能在不同社會情境中互相移植。再一次強調，理想類型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設計；而社會事實則是研究對象。

Weber 相信理想類型可以是靜態的，如科層組織；也可以是動態的，如權威類型的「路徑化」；相同的，Durkheim 相信社會事實可以是動作狀態，如思想、行為和感覺；也可以是存在狀態，如人口分佈。附帶一提的是，Weber 按類型把理想類型分成個別的、一般性的、複雜的觀念體系及發展的；Durkheim 也把社會事實按類型分成物質性與非物質性，不同在於區分的目的不同，因為 Weber 的理想類型論和他的實證研究無關；但社會事實卻是 Durkheim 朝向實證社會研究的對象。

理想類型是 Weber 方法論最重要的一環，對 Marx 而言，卻從不曾在其方法論上有意識建構及使用這樣的方法。在處理 Weber 與 Marx 理想類型使用之比較時，必須面臨 Marx 使用的概念，是一種理想類型的建構嗎？若是，那麼原來理想類型的使用，就不必再侷限於 Weber 既定的概念範疇和意涵。如果我們接受阿圖舍(Louis Althusser, 1918-)對 Marx 的詮釋，採用 Marx 自己的用法，將他所有的一些概念放在 ideal average 類型來瞭解，就能符合 Weber 對 Marx 的期望，認為 Marx 所展開的法則亦需用理想類型來理解。如此我們就可以進行 Weber 與 Marx 理想類型的比較。

第一，「如果我們說 Weber 理想類型具有可能性之本質意涵，則 Marx 之理想類型具有必然性意味」(陳介玄、翟本瑞、張維安，1989：141-142)，從 Weber 的選擇性親近性及 Marx 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瓦解的必然性可窺一二。對 Weber 而言，理想類型之理念，是在可能性中考察事物，透過可能性以認識現實性；對 Marx 而言，自然或社會存在的法則，所指的是兩個外表上互相矛盾事情間的內在和必然的聯繫。必然性首先是指各種現象的不可避免性、必然性，其次就是各種必然現象的相對確定性，因而必然性與普遍性所表現的是存在於自然界、社會的各種現象間和各個過程之間，一種法則式的深刻關聯。「以「法則」、「必然」的一元論式結構，和 Weber 從可能性、選擇性的指向對象，所形成的概念與對象必然分割的二元結構是極為不同的」(ibid: 144)。

第二，Weber 說道，「所有無限實體能為人們有限心靈所分析，是基於這樣的假設：這些實體中僅有一些有限的部分構成了科學探究的對象，單面性理想類型之強調源於他對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嚴密而精緻的知識論建構」(Weber, 1903-1917/1949: 72)。理想類型對 Weber 來說要建構來掌握這些無限實體中有價值瞭解的部分，必定是在單面的強調，文化實體單面向分析之正當性來自於價值關聯所給予的；相反的，Marx 認為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對 Marx 而言，歷史應從整體性來理解。要瞭解這些概念，必須使理想類型在整體性的意義下，所以 Weber 的部份與 Marx 的整體可以有明顯的對比。

第三，「對 Weber 而言，整個理想類型之目的，就是在於作為認識手段的啟發工具」(陳介玄、翟本瑞、張維安，1989：153)，因 Weber 整個理想類型的建構目的，乃是在於歷史實體的掌握和人文世界意義的挖掘，而非純理論概念的

龐大建構；相反的，Marx 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最後一條中提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可見 Marx 關心的是實踐對於理論的優先位置，理想類型的建構最後必然要體現實踐才有最終的價值，而實踐當下就是一種價值判斷。

對於 Marx 理想類型的用法和 Durkheim 之社會事實主張間的親近性，特別是成熟的 Marx，可以從社會事實的特色來與 Marx 的類型觀相互比較。

社會事實是 Durkheim 為了能有助於社會學脫離哲學的陰影，和獲得清楚與客觀性的社會研究獨特題材，由於社會事實被當成一種「事物」，所以能夠被實證經驗的研究，而不需將之哲學化；相似的，雖然早年 Marx 的作品中，例如《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充滿了哲學式的用詞，如異化、類存在等，但成熟的 Marx 作品中卻逐漸脫離哲學色彩，例如《資本論》中所使用的地租、資本等類型名詞，開始如 Durkheim 之社會事實般地朝向客觀、實證的道路前進。

Durkheim 的社會事實在於以一個先存的社會事實去推論出另一個新的社會事實的決定性因果關係；Marx 相信隨著歷史的變遷，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最後必定崩潰，產生無產階及革命，雖然 Marx 相信這是一個必然過程，和社會事實強調的因果性具有「決定」這個概念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是，Durkheim 強調的是「因果性」(Durkheim, 1990: 149)；而 Marx 所強調的是辯證關係。

Durkheim 所謂的社會事實是獨立於個人的主觀意志詮釋以及對個體具有強制性的作用；相似的，Marx 所謂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生產關係類型對個人，特別是無產階級一樣具有強制性，不同的在於 Marx 比 Durkheim 多了一份人道主義，帶有 Durkheim 所反對的主觀同情態度。

Durkheim 認為對真實社會的了解，只能透過以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事實來理解另一個社會事實，以期達到了解社會的目的；相似的，Marx 認為對歷史、社會的了解只能透過階級鬥爭這個類型來了解歷史社會過程。此外，Durkheim 認為社會事實的產生是用事實歸結出觀念，而不是由觀念歸結出事實；相似的，Marx 的剝削率、剩餘價值、獲利率等類型並不是由觀念產生，而是由真實生產過程中的計算得出。

雖然社會事實並不一定在任何不同的社會情境中都具有真實性，但就某一社

會情境所產生的社會事實而言，就具有真實性；相似的，Marx 的剝削、異化類型就他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具有真實性，但在一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就不具有真實性了。社會事實本身就是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目的，並導出另一個社會事實；同樣的，Marx 的剩餘價值、獲利率等類型其目的就是要導出無產階級受剝削的事實。最後，社會事實可以是動作狀態，也可以存在狀態；相似的，在 Marx 所使用的類型中，可以分類為有動作狀態的，如實踐、階級鬥爭；也可以是存在狀態的，如階級。

Simmel 最突出的方面表現在他自覺地拋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 Spencer 的有機理論以及他的德國同行所珍視的歷史地描述各種獨特事件的方法。Simmel 既反對有機學派也反對唯心主義學派，他既不把社會看作是 Comte 和 Spencer 式的有機體，也不認為社會僅僅是並不實際存在的某種事物，因此，他開啟了人們相互作用和聯繫起來的特定方式，是社會學工作者的主要研究領域，此外，他所提倡並付諸實踐的方法，就是集中精力研究長期的和有限數量的相互作用的模式。

Simmel 開啟了社會學中形式的研究，他有別於其他社會學家認為應該把社會相互作用的形式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特別是社會學要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不同於歷史學派和人文科學的其他代表人物。而且，Simmel 想建立一門社會生活幾何學，主張抽象地研究具體內容，並致力於探討社會生活的形式，因此人們在社會學上把他的理論稱之為形式社會學。Simmel 也類似於 Marx，社會學中的辯證法也出現在他身上，在社會學史中無前例地用辯證法闡釋社會團體之間動態的互相聯繫和衝突，又類似於社會學中的 Marx 及衝突論，不同的在於他強調了個人和社會、個體文化與客觀文化之間的聯繫如衝突。數字在所有社會學家的眼中，對 Simmel 來說，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

在 Simmel 的思想及研究中，對於個人心理的注意獨特於其他社會學家，當然潛意識的成份或多或少也就包含在研究的過程中，但這並不是說潛意識就是 Simmel 研究的最終目的。可以這麼說，潛意識的研究可能是目的，可能是工具，也有可能是一種研究過程，不過或多或少 Simmel 對於潛意識的注意力勝過 Marx、Durkheim 及 Weber 是可以較確定的。

由於 Simmel 學說中的微視社會學特徵，使他重視個人間結合與互動的細小

或內部要素之優先性，因此個人間的結合與互動對 Simmel 來說除了結構與環境的作用外，個人的主觀潛意識在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他所論述的《窮人》(The Poor)、《陌生人》(The Stranger)與支配從屬形式。對於 Marx 來說，階級類屬間的互動才是一個研究動點，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互動，專注的並不是個人間的互動，不過在 Marx 的 class for itself 中個人意識具有某種程度的決定力量；對 Durkheim 來說，互動的形式以個人與社會事實間的互動才是研究重點，個人與他人間的互動並不是個人的潛意識驅使，而是受到獨立於個人心智外的社會事實所驅使，或受到大規模社會變遷，如機械連帶變遷至有機連帶的社會所驅使。在 Durkheim 的著作中，個人互動與互動大部份未曾為他所分析，個人意識只不過是依變項而已；對於 Weber 來說，個人的行動與和他人的互動，必須使用詮釋學的工具—瞭悟來理解，雖然 Weber 拒絕認為瞭悟只是包含直觀、同情與擬情作用，瞭悟只是「豐富的智識工作之先決條件」(Weber, 1903-1917/1949: 115)，但意識在人與人間的互動仍然扮演了部份角色，此外，在 Weber 的社會行動中，特別是情感性行動，意識或個人潛意識在當中也扮演了重要性的決定因素。

Simmel 的學說思想，有四個基本層次的主題，首先是對於社會生活之心理面向的微視預設，認為高層次的社會實體是來自低層次的社會實體，因此對 Simmel 來說，個人的心理潛意識可以產生較高的社會實體，例如從個人到團體，團體到社會，具有發生學的影子。這一點對 Marx 來說，個人心理成份可說是微乎其微，因為 Marx 對社會的看法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來看，再看此社會結構下的個人，和 Simmel 恰好相反，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產生什麼樣的個人，而不是像 Simmel 認為個人的集合產生怎麼樣的社會；對 Durkheim 來說，一心一意專注大規模的社會結構，個人意識只是社會的依變項，並不像 Simmel 賦予意識太大的重要性，不過有一點和 Simmel 相似的是，Durkheim 認為社會是由個人集合起來的集體意識所形成也具有發生學的概念；在 Weber 行動的社會學中，最終是關切於個人，而非集體，這點和 Simmel 關心社會生活之心理成份類似，但在 Weber 的實質社會學中，他主要的興趣卻是在大規模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制度，這時，人的意識受到大規模社會的理性化禁錮，對於意識的研究，此時在 Weber 的身上就不在那樣重要了。此外，對於社會的形成，和 Simmel 的發生學

不同，Weber 以選擇性親近性來解釋新教徒在信仰、利益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親和性，此時潛意識又是 Weber 的重點所在。

「Simmel 認為人類具有創造的意識」(Ritzer, 1995: 289)，他對於創造力有著極大的興趣，他瞭解到人類必須將社會結構概念化，如此結構才能影響到人。社會並不只是「在那兒」，同時社會也是依賴意識活動的一些事物，社會的規範和價值將內化進入個人意識。「行動者接受外在環境的刺激之後，評估這些刺激，並審查各種行動過程，然後決定如何行動」(ibid: 290)。由此可知，Simmel 對於個人潛意識特別研究並付予重要地位。對 Marx 而言，則不給意識太大的自主性，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個人將其概念化，才能影響到個人，每個人在社會中，不論是否將之概念化或價值內化，都會影響到每個人，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赤裸裸地「在那兒」。

此外，Marx 和 Simmel 不同是，行動者接受外在環境刺激後，起而採取革命行動，是以無產階級普遍意識為基礎，並不是以個人潛意識為基礎；和 Marx 類似，個人潛意識對 Durkheim 來說也不像 Simmel 般地給予太多的自主性，對 Durkheim 而言，社會不管個人有無將其概念化或內化，同樣都約束、作用著每個人，如社會事實的存在，因此個人評估外在環境後的行動並不是潛意識的自主行動，而是遵循社會事實的被動行動；對 Weber 來說，類似 Simmel，在個人行動上，付予意識重要的作用與地位。Weber 認為社會行動，是那些在刺激發生與最後反應之間，涉入思想過程的中介之行動，而這思想中介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潛意識作用。對 Weber 而言，社會學分析的任務，即是援用「主體意義以詮釋行動」(Weber, 1921/1978: 8)，例如 Weber 界定「經濟行動為一「意識的」、「主要的」取向於經濟性的考慮，其中重要的並不是造成經濟提供的客觀必要事物，反而是其所必要的信念(belief)」(ibid: 64)。雖然 Simmel 和 Weber 都相信意識的自主性，但最後兩人同樣都承認大社會結構對個人的限制，如 Weber 的「鐵牢」與 Simmel 的「客觀文化」，最後兩人都同樣地表現出悲觀的想法。

Simmel 認為全部生活內容即使完全可以在社會歷程和相互作用的意義上研究，也必須同時從特殊性，即從個人經驗或個人潛意識的角度出發認識全部的生活內容，個人潛意識仍是了解社會的重要工具。和 Weber 相似，Weber 認為要了解真實的社會就要從社會行動著手，因 Weber 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研究社會行動的

科學，在不同的社會行動中，各自包含了成份不等的潛意識成份；較不同的是 Marx 及 Durkheim，Marx 認為要了解一個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必須從社會的生產方式來考察，並不是從個人，因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模式，制約了社會、政治和智識生活，「並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而且生產關係的整體，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這個實際的基礎之上，興起了法律、政治和宗教的上層結構，並且對應出一定的社會意識型態」(Marx, 1859/1970: 20-21)，Durkheim 則認為要了解一個社會，只有透過社會事實來瞭解，而不是透過個人潛意識，即使個人潛意識存在，也只不過是社會的依變項而已，要從社會來看個人潛意識，例如自殺，而不能從個人潛意識來看社會。

個人潛意識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穿過 Simmel 的全部社會學思想，例如社會總是一個包含著協調和衝突、吸引和排斥、愛和恨的統一體。和 Simmel 相似，Weber 認為個人潛意識與社會形式間存在著親和性，例如新教徒的意識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個人意識自由與理性化禁錮；相反地，Durkheim 關注的是社會事實和社會事實間的因果關係，個人潛意識和社會間並不是辯證關係，也不是親和性關係，而只是一種依變項和自變項之間的關係；對 Marx 來說，階級與階級間的辯證關係穿過他的大部份思想，個人意識並無特別討論。因此在方法上，Marx 和 Simmel 較相似，但對個人潛意識的重視，Simmel 和 Weber 較相信，兩人都給予個人潛意識討論的空間。

Simmel 認為社會應該允許個人不滿情緒的發洩，這種不滿的個人情緒潛藏壓抑在個人的潛意識中，如果沒有這種安全閥發洩個人潛意識中被壓抑的不滿情緒，很多社會關係就不可能持久；對 Marx 來說，無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不是個人潛意識的，而是普遍無產階級客觀不滿的情緒，不是靠個人潛意識不滿情緒的發洩，而是無產階級整體靠革命方法；對 Durkheim 來說，個人意識的不滿情緒不能違反道德與自利主義，受到社會事實的約束與道德教育的抹平，因此個人主觀潛意識在 Durkheim 眼中仍然是依變項，不能成為自變項；對 Weber 來說，具有個人潛意識的實質理性行動往往和客觀的形式理性行動產生緊張關係，個人主觀意識往往被犧牲了，雖然 Weber 和 Simmel 相同肯定個人意識的重要性，但兩人都對未來理性化感到悲觀。但是 Simmel 相信為了獲得個人的潛意識自由與實現其目的，人需要藝術、科學、宗教和法律，並內化這些價值，成為自身的一部份。

可以這麼說，Simmel 的社會學方法和研究綱領就其在社會學史上來說和 Durkheim 的是同等重要的，Durkheim 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的結構，把各種社會、各個個人聯繫在一起的總價值觀；而 Simmel 則致力於放在微視社會學上，他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的發展過程，他闡明了單個行動者們相互作用中的模式。他的形式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圖形，使得後來的社會學研究者可以按照這個圖形去預言社會行動者的活動。在社會學的發展歷史中，Simmel 永遠和 Durkheim、Weber 一樣有力地激發著社會學的想像力。

肆、結 論

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社會歷史變遷並非是一單純事件，它是累積西方社會從農業生活轉型至完全工業體系的知識發展。大量的農人離開農地，而進入急速繁榮的工廠從事工業工作；工廠本身則隨技術改進，而不斷創新轉變。巨型的經濟科層組織，也因應工業服務之需求而出現。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強調自由市場。同時，大多數人為了微薄薪資而夜以繼日工作以糊口，資本家卻從中獲取鉅額利潤，於是普遍地掀起了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企圖推翻資本主義體系，這些都全面掀起西方社會的劇變，並且深遠地影響社會學家。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全神貫注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它對整體社會製造產生的問題。他們的反應後人或照單全收，或改頭換面，或增刪修補，形成了幾個堅實的對資本主義社會性質透視的立足點。這些觀點，往往抽取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方面著眼，界定了日後整個社會學研究的範疇。

從 Marx、Weber、Durkheim 及 Simmel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焦點與方法中可以看出，Marx 對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採取批判的觀點；Weber 關心社會行動的意義以及歷史事件的獨特性，而非一般法則；Durkheim 深信不同社會存在著普遍的法則；Simmel 則關心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社會關係型態，這些古典社會學家影響產生古典社會學的四個類型，即批判的社會學、解釋的社會學、分析的社會學和形式的社會學。由此出發，類似於將社會學區分為詮釋社會學(explanatory sociology)、實證社會學(empirical sociology)與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三大主流的方式，本文歸納出在古典社會學眾多典範(paradigm)中存在著四種不同的

主要典範：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社會釋義(social definitions)、社會事實(social fact)與社會形式(social form)典範，當然這並不意味古典社會學就僅有這四種典範而已。所謂典範，「是存在某個科學領域內，關於其題材(subject matter)的基本意象(image)。它可以用為界定何者應該被研究、什麼問題應該被提出、如何質疑問題、以及對所獲得之答案在詮釋時所應該遵守的規則等等。所以，在一個科學領域內，典範乃是最主要、最廣泛的共識單位；而且，我們可以利用典範而區分不同的科學社群。簡言之，典範可以包含定義、以及關連那些存在其內的範例、理論、方法與工具等」(Ritzer, 1975: 7)。

從社會衝突典範來看，重點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變遷的解釋，認為社會變遷不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劇烈的，社會衝突具有一種「破壞的創造性」結果，亦即衝突在社會當中是不可避免的，而社會中的每一個單位都直接或間接成了社會的正向變遷，從 Marx 對資本主義分析的焦點來看，物質力量是決定歷史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思想只不過是物質的反映而已，社會的衝突是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和沒有生產工具的無產階級間的衝突，最後無產階級會逐漸因受壓迫而產生共同階級意識用以抵抗資產階級的剝削，這種社會衝突結果將朝向社會邁向正向結果即共產主義社會。因此，社會衝突典範使我們了解在進行社會研究時，應同時掌握社會內部衝突的形式及其正負向效果，此外，社會衝突典範也顯示當代主流社會科學的研究多偏向「形式邏輯」的操作化方式，但「辯證邏輯」卻能使研究者發現社會現象的另一層面及不同的解釋方式。

社會釋義典範關注於行動、互動、和實在界之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Weber 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焦點企圖明瞭社會行動，並達到對過程與結果的因果說明，Weber 關於社會行動的學說能幫助社會科學研究者在焦點置於行動者如何定義社會情境，以及這些釋義對於後繼的行動及互動之影響上，特別是對於觀察法的運用。社會事實典範關注於 Durkheim 所謂的社會事實，亦即大規模的社會結構與制度，依照社會事實典範的焦點，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社會的研究必須關注由普遍共識所維持的相互關連與秩序化，不同於社會衝突典範所強調的社會事實之間的無秩序或社會中的秩序維持來自於強制力量。

Simmel 肯定利益是一種趨力，促使人們建立所謂的社會關係形式，而資本

主義社會中的利益也必須透過這些社會關係形式來表達。對 Simmel 而言，所謂的社會其實就是一種關係的集合，換言之，唯有在人與人互動產生關連的時候，社會才在彼此之間形成。因此，個人只不過是各種社會聯繫連接的地方，個人特質只不過是實現社會聯繫的特殊方式，在種種關聯與交互作用之下，呈現出個人的想法，行動與社會是相互建構而成的。若採用社會形式典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分析社會時就需要考慮其中的各種關係形式，特別是團體間的距離與團體內的人數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後果。此外，不同於社會事實典範「自上而下」的分析方式，社會形式典範促使社會科學研究者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來分析社會，因為 Simmel 認為較高層次的社會實體源自於較低層次的社會實體，例如從個人到團體，團體到社會，具有發生學的影響。

從四個社會學典範可以延伸出社會科學研究的鉅視、微視、主觀及客觀四個層次，並在這四個層次間有著不同的組合方式。鉅視是將分析焦點置於大規模的社會現象如資本主義社會與文化；微視是將分析焦點置於個別的行動者及其行動、團體、階級與組織等；主觀多指涉觀念或意識形態；客觀則是關於真實的物質事件。社會衝突典範專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鉅視客觀經濟結構並同時關注階級意識的主觀面向；社會釋義典範關注微視的主觀性亦即行動者的感情與思想，但並不是社會釋義典範就完全排除鉅視的客觀性部份，例如 Weber 雖然關注行動者但也注意到科層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化發展；社會事實典範雖然著重於客觀面向例如法律等物質性社會事實，但也同時考慮非物質性社會事實的主觀面向例如集體意識等，但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典範皆傾向於從鉅視觀，也就是分析自上而下對行動者所造成的結果；社會形式典範重視微視的個人間結合與互動內部要素，不像社會事實典範般重視鉅視面向，而是從微視的自下而上方式來檢視關係形式如何構成鉅視的社會，此外也關注個人心理潛意識的主觀面向，亦即行動者接受外在環境的刺激之後，主觀的評估這些刺激，並審查各種行動過程，然後決定如何行動。從這四種社會科學的研究典範與層次可以了解，社會科學的研究雖然無法兼顧各個面向，但至少能夠了解自己在解釋上的限制或盡可能的在各個面向間相互連結。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因此 Marx、Weber、Durkheim 與 Simmel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能給當代經濟學研究提供啟示。經濟學與

社會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或活動的科學，特別是指生產、分配及消費等行為，這種行為或活動只是人類社會行為或活動的一種，它與社會其他方面的行為或活動常是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就一個社會的生產活動來說，它必然受到一社會的制度、組織、人口組合與文化之影響，研究經濟學若是對這些方面的事實沒有了解，對生產的行為也就無法完全了解。因此，Marx、Weber、Durkheim 與 Simmel 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此一特殊的經濟體系時，都反對功利主義式的「個人自由競爭經濟利益」觀點，而是將各種社會現象與經濟生產面向相互論證，探討經濟在社會中的角色與衝擊，這是社會學對於資本主義分析不同於經濟學的地方。

參考書目

1. 高承恕：《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
2. 陳介玄、翟本瑞、張維安：《社會實體與方法-韋伯社會學方法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
3. Durkheim, Emile 著，黃丘隆譯：《社會學研究方法論》(台北：結構群出版社，1990年)。
4. Ritzer, George 著，馬康莊、陳信木譯：《社會學理論(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5年)。
5.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 D. Hall. Hong Kong
6. Kong. Macmillan (1893/1984).
7. Durkheim, Emil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895/1964).
8. Durkheim, Emile. Suicide. New York. Free Press (1897/1951).
9. Durkheim, Emile. Moral Education. Translated by Everett K. Wilson and Herman Schnur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25/1973).
10. Durkheim, Emil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 U.S.A. Greenwood Press (1983).
11.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45-1846/1970).
12. Marx, Karl.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59/1970).
13.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867/1967).
14. Ritzer, George.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5).
15.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07/1978).

16. Simmel, Georg.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K. Peter Etzkor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1/1968).
17. Simmel, Georg.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Forms. Edited by Donald Levine.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1).
18.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03-1917/1949).
19. Weber, Max. Economic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1/1978).